

# 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山东省五县区477名受访者的调查分析

陈东<sup>1</sup>, 安颖<sup>2</sup>

(1.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通过山东省五县(区)477名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问卷数据, 运用 Ordered Logit 和 SEM 模型对这一群体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分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 86.6%的受访者对总体生活表示“很满意”和“基本满意”, 且受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显著影响; 人均年收入、个人发展空间、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技能发挥程度、城镇融入度与生活满意度水平呈正相关, 获得的就业和创业指导越多, 其生活满意度评价越高。

**关键词:** 新生代回流农民工; 生活满意度; Ordered Logit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17)08-0003-08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于2010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迄今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全国总工会的定义,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加鲜明的特质: 一是双向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且对务农兴趣不高, 同时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薪的工作, 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城乡两端均处于边缘状态; 二是观念现代化。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期, 更多地把进城务工视为谋求发展的途径, 文化素质水平一般较高, 愿意主动学习新事物和新知识, 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高; 三是人的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多长于城市, 对土地的依赖感减弱、城市的归属感增强, 在工作和城市的变换中掌握了新技能而自我城镇化, 顺应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选择回流的人数逐渐增多, 并由十几年前的“进城务工”转为现在的“回流就业、创业”。换言之, 回流是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经历农村-县城-小城市-大中城市等不同地区间的往返流动后, 最终选择回到离家乡较近的县城或中小城市定居发展的现象。据统计, 截至2013年底, 我国农民工总规模约2.68亿,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比重高达65.5%。戚迪明等(2014)的调查发现90.98%的回流农民工已成为回流县镇的永久迁移者, 其市民化程度高达78.72%<sup>[1]</sup>。近年来, 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正迎来一个高潮期, 其回流后的生活现状及影响因素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从群体特征看, Liu等(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流动群体, 他们渴望融入并享受

收稿日期: 2016-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BJY096)

作者简介: 陈东(1969-), 男, 浙江杭州人,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安颖(1993-), 女, 山东日照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城市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面临种种障碍<sup>[2]</sup>。Yue 等(2009)通过对比两代农民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长期定居城市生活而真正成为了一名“市民”,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暂时性地外出务工后又回到农村<sup>[3]</sup>。无独有偶,王春光(2001)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一般具备初中学历,职业期望较高,他们进城的目的是“闯天下、寻发展”,打工不是为了讨生活,而是为了实现“都市梦想”<sup>[4]</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混合性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最终会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sup>[5]</sup>。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回流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sup>[6]</sup>。

从回流原因看,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长期以来,老一代农民工的回流均被视为一种负向选择,即回流者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更低、年龄偏大,在城市寻求工作和适应城市生活存在困难<sup>[7][8]</sup>。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的自主选择性更强,李新平(2014)将之概括为四种情形:因失业而回流;因家事和劳动力个人原因而回流,包括照顾老人、婚育和抚养、建房、健康状况和年龄等;因“推拉”效应、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歧视等制度原因而回流;因创业而回流<sup>[9]</sup>。Wang(2001)进一步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回流时不会选择重回农村,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不具备农业生产技能且不愿意务农,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农村耕地日益减少<sup>[10]</sup>。

从城市融入度看,秦昕等(2011)基于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融合模型,发现农民工工作的社会地位是决定其社会融入性与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因素<sup>[11]</sup>。刘程(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是理性考量的结果并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同时该群体正以“同化”和“整合”的方式进行城市融合<sup>[12]</sup>。另有研究还发现,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留城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对公平和市民化拥有更高的诉求并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市人<sup>[13][14]</sup>。

综观现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群体特征、回流原因与城市融入等相关问题,很少涉及这一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反观现实,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是该群体城镇化、市民化过程的根本动力和目标,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选择和政策方向,非常有必要予以关注和研究。其二,从调研地区看,现有文献仅集中于一个县市或选择多个地区的单一县市进行调查,由于中国不同县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异质性很强,这样的调研地区选择可能导致样本代表性缺乏典型意义。其三,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研究多采用两类 Logistic 模型,但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简单合并为二维评价会导致大量数据信息的丢失,因此现有研究成果的缺憾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空间和必要性。

## 一、样本分析和变量选取

###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与日俱增。截至 2014 年底,新生代农民工达 1205 万人,占全省农民工的 56.02%,其中选择回流的人群达 300 多万,占农民工总数的 24.9%。为此,本文采用随机抽样法,首先从山东省 17 个地市中随机选取济南、淄博、聊城、菏泽和日照,然后在其下辖县区中随机选取济南平阴县、淄博周村区、聊城茌平县、菏泽单县和日照东港区等五个县区进行问卷调研。同时,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我们严格规定了调研对象的条件,即必须是 1980 年之后出生、必须是农业户口、必须去过比现居地更大的城市打过工。调研组共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77 份,回收率达 95.4%。

表 1 给出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特征。(1)性别和文化程度。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群体中以男性为主(占比 67.1%),女性仅占 32.9%,不及男性总数的一半。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76.1%的人拥

有高中(含中专)以上学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素质和学习能力方面更胜一筹。(2)婚恋情况。已婚者居多(占比54.1%),究其原因,已婚者本身面临较高的迁移成本,承担的家庭责任较大,往往考虑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而选择回流,并更加注重家庭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这与王子成和赵忠(2013)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sup>[15]</sup>。(3)职业选择。69.6%的受访者选择就业且普遍集中于服务业(22.1%)、工作单位办事人员(14.7%)和专业技术人员(12.2%)等领域。其中,服务业主要集中于餐饮、美发等行业,该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大,对个人技能要求不高且青睐于年轻人群,因此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后的主要就业选择。对从事工程师、IT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其自身拥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回流后基本不会改变行业且容易找到工作。与此同时,27.9%的受访者回流后选择创业成为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收入水平较高,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后的创业发展潜力较大。(4)收入水平。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年收入水平集中在2~4万,占比高达59.5%;年收入高于4万的比例为33.2%,而低于2万的比例仅为7.3%。回流农民工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为可观,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1 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变 量			变 量		
占比(%)			占比(%)		
性 别	男	67.10	文 化 程 度	小学及以下	1.90
	女	32.90		初中	22.00
婚 恋	单身	25.20		高中(含中专)	35.40
	恋爱中	19.70		大专及以上	40.70
	已婚	54.10	职 业 选 择	服务业	22.10
	离异或丧偶	1.00		个体户、私营业主	27.90
收 入 状 况	2万及以下	7.30		办事人员	14.70
	2~4万	59.50		专业技术人员	12.20
	4~6万	20.70		企业部门负责人	4.00
	6~8万	5.80		无业、失业和半职业者	2.50
	8万以上	6.50		其他	5.30

(二)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总体生活满意度( $Y_1$ ),以“您对回流后的生活是否更加满意?”这一问题来度量。受访者的回答有三个选项,即“很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在接受调查的477人中,表示“很满意”的比例为41.9%,认为回流选择完全正确;表示“基本满意”者占44.7%,认为虽有偏差但基本正确;仅有13.4%的受访者“不满意”,后悔选择回流,认为大城市生活满意度更高。由此可见,高达86.6%的受访者对总体生活表示满意。

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选取生理需求满意度( $Y_2$ )、安全需求满意度( $Y_3$ )、情感需求满意度( $Y_4$ )和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 $Y_5$ )等进行深入解释,并通过对定性数据的量化赋值转变为定序数据,便于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见表2所示)。

表 2 变量的赋值及说明

类 型	名 称	赋值及说明
被解释变量	总体满意度( $Y_1$ )	很满意=1,基本满意=2,不满意=3
	生理需求满意度( $Y_2$ )	提高=1,差不多=2,降低=3,不知道=4
	安全需求满意度( $Y_3$ )	提高=1,差不多=2,降低=3,不知道=4
	情感需求满意度( $Y_4$ )	社会交往更加容易=1,社会交往没有明显变化=2,社会交往更加困难=3
	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 $Y_5$ )	很满意=1,基本满意=2,不满意=3

续表2

类 型	名 称	赋值及说明
自身条件	性别( $X_1$ )	男 = 1, 女 = 2
	文化程度( $X_2$ )	小学及以下 = 1, 初中 = 2, 高中 = 3, 大学及以上 = 4
	人均年收入( $X_3$ )	2万以下 = 1, 2~3万 = 2, 3~4万 = 3, 4~5万 = 4, 5~6万 = 5, 6~7万 = 6, 7~8万 = 7, 8万以上 = 8
	职业( $X_4$ )	制造业、建筑业普通工人 = 1, 餐饮、酒店、美容美发等服务业劳动人员 = 2, 个体户 = 3, 私营企业主 = 4, 工作单位办事人员 = 5, 专业技术人员(如工程师等) = 6, 企业或商业负责人 = 7, 运输员 = 8, 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者 = 9, 环保工人 = 10, 其他 = 11
解释变量	好友数量( $X_5$ )	0个 = 1, 1~3个 = 2, 4~6个 = 3, 7~9个 = 4, 10个及以上 = 5
	子女教育( $X_6$ )	本地上学 = 1, 户籍地上学 = 2, 无子女 = 3
	社会保险( $X_7$ )	工作单位提供 = 1, 工作单位不提供 = 2, 不知道 = 3
	工作技能发挥( $X_8$ )	充分发挥才能 = 1, 基本发挥才能 = 2, 极少发挥才能 = 3, 不知道 = 4
	就业指导( $X_9$ )	提供 = 1, 不提供 = 2, 不知道 = 3
	创业意愿( $X_{10}$ )	有创业意愿 = 1, 没有创业意愿 = 2, 没考虑好 = 3
	个人发展空间( $X_{11}$ )	回流后发展空间扩大 = 1, 回流后发展空间缩小 = 2, 不知道 = 3
	生产环境安全状况( $X_{12}$ )	不存在安全隐患 = 1, 安全状况一般 = 2, 生产环境存在安全隐患 = 3, 不知道 = 4
	工资是否按时发放( $X_{13}$ )	都能按时发放 = 1, 经常按时发放 = 2, 很少按时发放 = 3, 从未按时发放 = 4
	城镇融入度( $X_{14}$ )	不存在 = 1, 没有明显感知到但觉得存在 = 2, 有部分人排斥 = 3, 排斥或偏见普遍存在 = 4
	文化服务水平( $X_{15}$ )	提供 = 1, 不提供 = 2, 不知道 = 3

图1的初步统计结果表明,在总体生活满意度( $Y_1$ )方面,41.3%的受访者表示回流后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大大提升,46.1%的受访者表示回流前后生活变化不大,只有12.6%的受访者表示生活水平有所降低,可见回流并未造成满意度评价的下降。在情感需求满意度( $Y_4$ )和自我实现满意度( $Y_5$ )方面亦大致呈现类似的规律。然而,在生理需求满意度( $Y_2$ )和安全需求满意度( $Y_3$ )方面,回流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的影响较大,且满意度上升和下降的比重几乎相当,只有不超过21%的人认为回流前后差别不大。综合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后的生活状况并未达到预期水平,因此有必要探究该群体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影响因素。

### (三) 解释变量

考虑到“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评价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选取了15个解释变量并对变量进行量化赋值(见表2所示)。

##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一) 模型选择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多分类变量且为有序数据,本文采用 Ordered Logit 模型对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根据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层次性关联分别建立三个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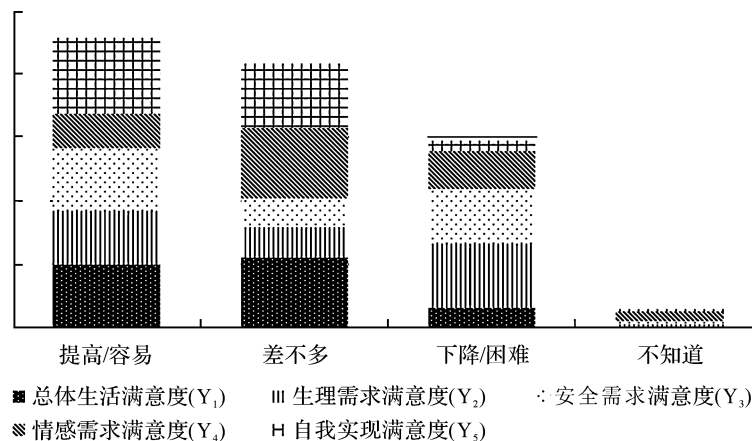


图1 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

模型:

首先,建立以总体满意度( $Y_1$ )为因变量、分满意度( $Y_2 - Y_5$ )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以了解分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的解释作用。

$$Y_1 = \alpha_1 + \sum_{i=2}^5 \beta_i Y_i + \varepsilon \quad (i=2, 3, 4, 5) \quad (1)$$

其次,建立总体满意度( $Y_1$ )与15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考察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对生活总体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Y_1 = \alpha_2 + \sum_{j=1}^{15} \gamma_j X_j + \varepsilon \quad (j=1, 2, \dots, 15) \quad (2)$$

最后,建立各个分满意度( $Y_2 - Y_5$ )与15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考察该群体的自身特点和外部环境分别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Y_i = \alpha_3 + \sum_{j=1}^{15} \sigma_j X_j + \varepsilon \quad (i=2, 3, 4, 5; j=1, 2, \dots, 15) \quad (3)$$

##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影响总体满意度( $Y_1$ )的分满意度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生活总体满意度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满意度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表3 多类别 Ordered Logit 逐步前进法回归分析结果(N=477)

分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Y_1$ )	分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Y_1$ )
生理需求满意度( $Y_2$ )	0.268 ***	情感需求满意度( $Y_4$ )	0.306 ***
安全需求满意度( $Y_3$ )	0.303 ***	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 $Y_5$ )	0.389 ***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为检验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对15个变量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15个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对此,本文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将其余变量逐一引入模型,基本思想是根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率进行排序,按从大到小的顺序选择进入模型的变量,并保证具有共线性的自变量不会同时被引入方程,最后所得的变量都是有统计学意义的,从而得到最优回归方程。由表4的 Ordered Logit 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总体生活满意度( $Y_1$ )同时受到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从自身条件看,性别( $X_1$ )对生理需求满意度和情感需求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反映男性对生理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满意度高于女性。文化程度( $X_2$ )对安全需求满意度和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的影响显著,表明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学历越高,其安全需求满意度越低、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越高。究其原因在于拥有高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放弃在外务工而选择回流到离自己家乡较近的城镇更多的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实现人生梦想,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较高,但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及户口、社会保障、就业等诸多问题,该群体也常常处于现实迷茫与未来信念的矛盾之中,安全需求满意度相对较低。人均年收入( $X_3$ )对总体满意度和生理需求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即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越高,其生活满意度和生理需求满意度就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好友数量( $X_5$ )越多,其总体生活满意度和情感需求满意度越高,但生理需求满意度越低。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青壮年时期,常年在外务工导致对朋友的情感诉求较强。朋友作为社交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给予其安慰并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需求和精神寄托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不仅如此,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来群体,农民工主要通过社交网络寻找工作<sup>[16]</sup>,朋友数量对个人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子女在本地上学( $X_6$ )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生活满意度较高,其安全需求、情感需求的满意度也相应较高。

表 4 多类别 Ordered Logit 逐步前进法回归分析结果 (N=477)

类型	名称	总体满意度 (Y <sub>1</sub> )	生理需求满意度 (Y <sub>2</sub> )	安全需求满意度 (Y <sub>3</sub> )	情感需求满意度 (Y <sub>4</sub> )	自我实现需求满意度 (Y <sub>5</sub> )
自身条件	性别(X <sub>1</sub> )		0.616 **		0.321 *	
	文化程度(X <sub>2</sub> )			0.238 **		-0.258 **
	人均年收入(X <sub>3</sub> )	-0.201 ***	-0.157 ***			
	职业(X <sub>4</sub> )	-0.107 **				
	好友数量(X <sub>5</sub> )	-0.322 ***	0.257 **			-0.154 *
	子女教育(X <sub>6</sub> )	0.237 **		0.182 *	0.361 ***	
外部环境	社会保险(X <sub>7</sub> )	0.496 ***	0.361 **	0.701 ***	0.668 ***	
	工作技能发挥(X <sub>8</sub> )	0.574 ***	0.485 ***	0.416 ***		
	就业指导(X <sub>9</sub> )			0.286 **	0.352 ***	
	创业意愿(X <sub>10</sub> )	0.414 **	0.652 ***	0.378 ***	0.607 ***	0.366 ***
	个人发展空间(X <sub>11</sub> )	0.733 ***	1.047 ***	0.749 ***	0.663 ***	0.772 ***
	生产环境安全状况(X <sub>12</sub> )		0.359 ***			
	工资是否按时发放(X <sub>13</sub> )					0.037 **
	城镇融入度(X <sub>14</sub> )	0.331 ***	0.309 ***			
	文化服务水平(X <sub>15</sub> )	-0.362 *	-0.453 *		0.471 ***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外部环境看, 社会保险(X<sub>7</sub>)对生活满意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显著影响到总体满意度及其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满意度。然而, 为回流农民工切实提供基本社会保险的工作单位仅占 52.4%, 高达 44% 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保险, 而后者生活满意度远低于前者。因此, 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是其满意度评价低于预期水平的重要原因。工作技能的发挥程度(X<sub>8</sub>)、就业指导(X<sub>9</sub>)、生产环境的安全状况(X<sub>12</sub>)、工资发放情况(X<sub>13</sub>)和城镇融入度(X<sub>14</sub>)均与生活满意度息息相关。工作技能的充分发挥和良好的城镇融入度有利于提升生活满意度, 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就业指导也直接影响这一群体的安全需求和情感需求。该群体对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抱有强烈的期待, 更倾向于通过接受就业培训和指导来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 以便把握更好的就业机会甚至创业。可见,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交往, 之所以回流更多的是基于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远远超越了传统农民工的生理需求。值得注意的是, 创业意愿(X<sub>10</sub>)和个人发展空间(X<sub>11</sub>)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和分满意度(Y<sub>2</sub>-Y<sub>5</sub>)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即回流后具有创业意愿、发展空间扩大的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事业发展空间小的群体。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仅有 45.5% 的受访者对现有工作持非常满意的态度, 71.9% 的受访者有意愿自主创业, 回流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的要求较高, 基本的生理需求已无法满足该群体追求自身价值的目标, 自主创业和重新就业才是新一代农民工对自身价值重新认识与定位的过程。

### 三、进一步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 SEM(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检验分析。SEM 是一种融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于一体的多元统计技术, 不仅能方便处理多个原因、多个结果的关系, 而且能实现对潜变量和显变量关系的测量。

根据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分类, 我们分别设置“生活满意度”、“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三个潜变量, 对应的观测变量分别是 Y<sub>1</sub>-Y<sub>5</sub>、X<sub>1</sub>-X<sub>6</sub>和 X<sub>7</sub>-X<sub>15</sub>。本文利用 AMOS 21.0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并画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路径图(见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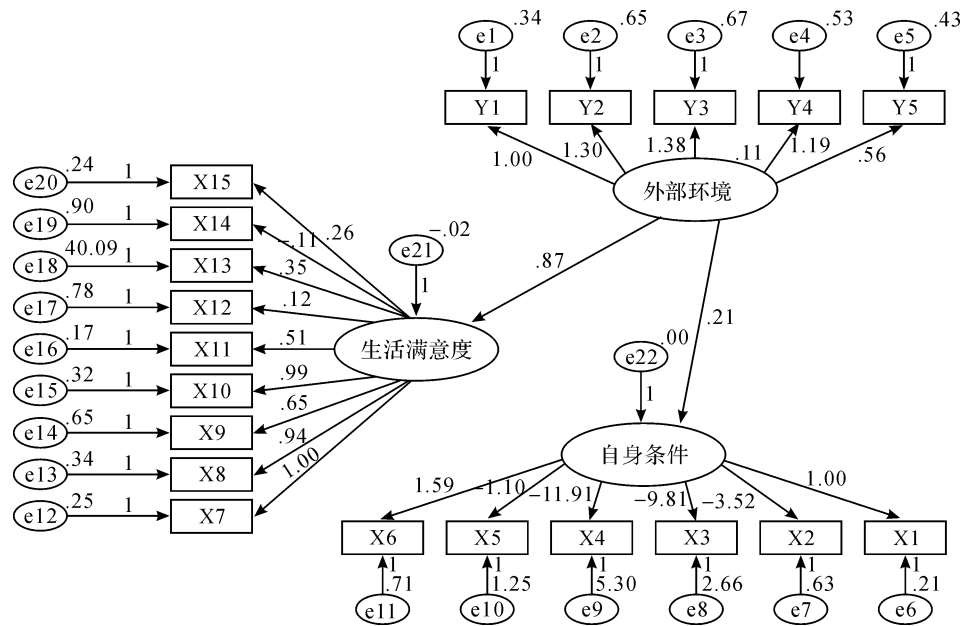


图2 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SEM 路径

在图2中，我们将每个潜变量与对应的一个观测变量间的载荷系数设置为1，以确保潜变量和观测变量的量纲一致性，其中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及观测变量与潜变量间的载荷系数反映了两者的相关性。由图2可见，观测变量的人均年收入( $X_3$ )、职业( $X_4$ )、好友数量( $X_5$ )与潜变量间的载荷系数为负，说明与之呈负相关，其他的载荷系数都为正，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同时，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全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解释变量中， $Y_1 - Y_5$ 与对应的潜变量“生活满意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与表3的计量结果一致。此外，是否按时发放工资( $X_{13}$ )、生产环境安全状况( $X_{12}$ )、城镇融入度( $X_{14}$ )与对应潜在变量在5%的水平下不显著，亦与表4的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再次证明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山东省五县(区)477名新生代回流农民工的问卷数据，运用 Ordered Logit 和 SEM 模型对这一群体进行了分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解释变量对总体满意度和解释变量对分满意度等三个层次的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总体生活满意度受到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显著影响，自身条件中文化程度、人均年收入、好友数量和子女教育均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外部环境社会保险、工作技能发挥程度、工作单位是否按时发放工资、自主创业意愿和城镇融入度是生活满意度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结合上述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首先，个人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新生代回流农民工个人职业发展的主要阻碍，政府应提供多层次、多维度和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并在培训内容上注意与市场需求相匹配，提高培训的质量；其次，无论是总体满意度还是分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始终是影响该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基于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保缴费率偏低的现实，政府需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保体系，加强对企业单位的监督约束，确保其为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险缴费，以提高劳动者的保障水平；再次，由于子女教育关系未能及时转移，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后其子女无法在回流地享受平等受教育权甚至承担高额的借读费，政府应做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

教育工作,保障随迁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最后,自主创业和重新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价值重新认识与定位的过程,政府要鼓励和积极引导自主创业并在资金及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参考文献:

- [1] 戚迪明等. 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现实考量与政策选择[J]. 农村经济, 2014, (10): 8-11.
- [2] Liu C., J. Xu.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1), pp. 6-12.
- [3] Yue Z., S. Li, M. W. Feldman, H. Du. Wandering at Crossroa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evelopment Will of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Rural Workers [J]. Population and Economics, 2009, (6), pp. 58-66.
- [4]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 (3): 63-76.
- [5] 韩长赋.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 经济研究, 2006, (12): 4-12.
- [6] Liu Y., Z. Li, W. Breitung. The Social Networks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e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2, 36(1), pp. 192-200.
- [7] Liang Z., Y. Wu.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New Methods and Findings [Z].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inneapolis, MN, 2003.
- [8] Wang W., C. Fan.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Repeated Circular Migr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ndocumented Migrants [J].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2006, (38), pp. 939-958.
- [9] 李新平. 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4, (3): 93-96.
- [10] Wang C. Social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Hobo and Merger of Urban and Rural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1, (3), pp. 63-74.
- [11] 秦昕等.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影响模型[J]. 管理世界, 2011, (10): 48-57.
- [12] 刘程.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8): 60-64.
- [13] 钱文荣, 李宝值. 初表达成度、公平感知度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调研数据[J]. 管理世界, 2013, (9): 89-101.
- [14] 姚植夫, 张译文.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北四省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8): 46-55.
- [15] 王子成, 赵忠. 农民工迁移模式的动态选择:外出、回流还是再迁移[J]. 管理世界, 2013, (1): 78-88.
- [16] 刘林平等. 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民工荒”问题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8): 45-53.

## Life Satisfaction of New-generation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477 Respon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EN Dong<sup>1</sup>, AN Ying<sup>2</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Using 477 new-generation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questionnaires in five coun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mak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ir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sub-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y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SEM model respective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86.6% of respondents were “very satisfied” or “basically satisfied” with life, and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hysiological needs, security needs, emotional needs and self-actualization needs. Their income, personal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skills and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town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overall satisfaction. The more employment or business guidance they can gain from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 higher their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is.

**Key words:** New-generation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Ordered Logit Model

(责任编辑: 化 木)